

何祚庥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增订版)

HEZUOXIU LUN
MAKESIZHUYI JINGJIXUE

何祚庥 著
庆承瑞 编

何祚庥论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增订版)

HEZUOXIU LUN
MAHUYI JINGJIXUE

何祚庥 著
庆承瑞 编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Capital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Business Press

· 北 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何祚庥著;庆承瑞编. --增订版. --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19.7

ISBN 978-7-5638-2806-7

I. ①何… II. ①何… ②庆… III. 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 IV. ①F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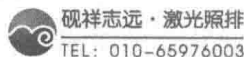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123518号

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增订版)

何祚庥 著 庆承瑞 编

责任编辑 曾三林

封面设计



出版发行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红庙(邮编100026)

电 话 (010)65976483 65065761 65071505(传真)

网 址 <http://www.sjmcb.com>

E-mail publish@cueb.edu.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照 排 北京砚祥志远激光照排技术有限公司

印 刷 北京九州迅驰传媒文化有限公司

开 本 710毫米×1000毫米 1/16

字 数 650千字

印 张 37

版 次 2019年7月第1版 2019年7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638-2806-7/F·1546

定 价 128.00元

图书印装若有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为什么要在他的晚年 转而研究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增订版代前言)

何祚庥

一、为什么要再版《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

2016年,应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编辑兰士斌之约,庆承瑞同志将何祚庥1957年以来已陆续发表和尚未发表的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如有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与时俱进”的探讨,有关“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若干理论阐述,以及《一个可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统一在一个方案的数理经济模型》《必须将“科技×劳动”创造使用价值的思想引入新劳动价值论的探索和研究》等20余篇论文,汇编成约48万字的《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2016年10月由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此书鲜明提出的核心观点是,“当代经济学研究应将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论统一为‘劳动和效用统一的价值论’”,也就是认为应构建一个

效用 = 使用价值 = 体力劳动所创造的价值 × 脑力劳动所创造的社会总效率因子的新理论,或又称为“效用 = 劳动 × 知识”的“新劳动价值论”。由于这一新理论的提出适应了时代的要求,此书初版在甚短的一年时间便又加印了。

现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进入新时代。2016年出版的《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所建议的“新劳动价值论”,显然是为适应“新时代”而提出的。为适应“新时代”带来的“新需要”,特别是为适应“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所提出的系列新思想、新观点,响应读者和出版社的建议,现在2016年版《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以下简称第1版)基础上,添加若干2017年以来我们陆续新发表或新撰写的论文,以《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增订版)》(以下简称增订

* 本文为未刊稿,完稿于2018年。

版)形式再版,也就是说,本次增订版主要新增十九大以来若干新撰写但能更好地解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诸多新现象、新问题的研究论文和文章。

二、新添加的十九大以来新写的七篇文章的要点

1. 增订版新增收的第一篇是《中国科学院院刊》2018年第33卷第4期发表的访谈录——《何祚庥:回望1979年“科学的春天”》。作为“科学的春天”的亲历者之一,我的访谈录对邓小平从“科学技术是生产力”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思想的由来和发展的脉络做了系统的梳理,也提到了本书收进的多篇近几年的研究论文所涉及的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工作。

2. 新增收的第二篇是《关于建立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对话》。这一长篇对话原刊登在由中共中央统战部主管的《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17年12月出版的当年第6期上。既然中国已经进入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时代,我们设想中的《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增订版)》当然也应该与时俱进,讨论一些“新时代”所提出的重大理论问题!尤其是“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出,要‘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请注意,这里的提法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人民命运共同体’,更没有用‘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等词汇”^①。

3. 为了进一步探讨“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新提出的重大理论表述,增订版还收入了新撰写的重新探讨新劳动价值论应满足哪些基本公式的三篇短文。其中首先是第三篇即《新时代呼唤新劳动价值论》,它是原刊于2017年9月23日《环球时报》上的一篇短文。此文讲了为什么新时代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要呼唤“新劳动价值论”,主要列举了两大理由:

一是“世界经济已……取得飞速进展,脑力劳动已起着越来越重要的第一位的作用”。正如邓小平同志1988年在一次谈话中所指出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要把‘文化大革命’时的‘老九’提到第一”^②。

二是“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只给出了由劳动计算价值的基本公式, $W = C + V + m$,却缺少对价值形态的另一侧面——使用价值,亦即效用的定量的研究”^③。

为走出上述两大困境,新劳动价值论当然要将脑力劳动对经济发展的贡献,

① 参见本书第20页。

②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75页。

③ 参见本书第27~28页。

特别是对使用价值亦即效用的贡献,也引入探讨中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了体现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两个“第一”的思想,知识和劳动的关系应该是相乘而不是相加。或者说:

$$\text{效用} = \text{劳动} \times \text{知识}$$

当然,由于我们研究的是如何拓展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使用范围,所以我们新导出的基本公式中仍然包含着原有的计算价值的公式,只不过在价值转移量里又加上了脑力劳动者所实现的价值量的转移。新添加的还有如何计算使用价值也就是效用的基本公式,以及知识是包括科技和市场这两类知识相乘的公式。总之,共写出4个基本公式,用以描述新劳动价值论。

我是理论物理学家。理论物理学首先研究的是建立某一物理领域内的基本公式。力学是由牛顿三大定律组成的,热力学也是由热力学的三大定律组成的,等等。为进一步研究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同样也首先要确立这一新领域的基本公式。

4. 新收入的第四篇——《从“初出茅庐第一功”看为什么必须用效用衡量经济效益的大小》,是一篇杂文。由于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被”请出山。刘备“如鱼得水”。等到曹操派夏侯惇带十万大军攻打新野,而刘备却只有约五千人的小部队时,张飞等人说怪话:“何不使‘水’去?”结果,诸葛亮调度有方,打退了夏侯惇的进攻。那么,应如何评定诸葛亮的功劳的大小?这就是用《新时代呼唤新劳动价值论》一文里第三个基本公式

$$\text{效用} = \text{劳动} \times \text{知识}$$

来讨论和回答诸葛亮贡献的大小。由于这一故事比较形象,而且其实是定量地回答了怎样计算脑力劳动者贡献的问题,我曾在若干场合用它做比喻,介绍新劳动价值论,大家认为十分有道理,所以本书增订版便收进了这篇杂文。

5. 新收入的第五篇是《我们能否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新古典经济学之间架起一座可以相互对应的桥梁?》,这是一篇较长的讨论性文章,它所讨论的问题是:“我们能否用‘脑力劳动 $\times$ 体力劳动’的‘实体论’的模型,求出新古典经济学里的总生产函数?”^①

新古典经济学将总生产函数 Q 表示为 A, K, L 的函数,也就是:

$$Q = AF(K, L)$$

如果将 Q 用新劳动价值论里的不变资本 C 、可变资本 V 、剩余价值率 P' 以及新增

^① 参见本书第33页。

加的表示脑力劳动者自身具有但逐步转移的价值量 U 、广义效率因子 N 等变量来表示,那么,从文中四个基本公式就能求解出总生产函数 Q ,它可表示为由两项相乘的算式:

$$Q = [N(1 + p') - 1](C + U + V)$$

于是,在总生产函数 Q 里的 $A = [N(1 + p') - 1]$,而 $F(K, L) = (C + U + V)$ 。而因此,我们便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间架起了一座可互相沟通的桥梁。那么,这里架起的“新桥梁”给我们带来了哪些新的启示呢?

实际上,只要对新导出的总生产函数略做考察,就会发现这一新导出的算式是十分合理的算式。后面一项 $F(K, L) = (C + U + V)$,代表着所投入的“死劳动 + 活劳动”并转移到产品中的价值;前面一项 $A = [N(1 + p') - 1]$,却正好表示所投入的脑力劳动 U 这一智力贡献产生的效率因子。而后者即 A 又正好是新古典经济学里的全要素生产率,只不过我们现在对全要素生产率 A 给出了一个“实体性”的解读。

更重要的是,这里的 A 明显地包含着两项:一项是包含剩余价值产生率 p' 在内的 $N \times p'$ 项,另一项是不包含 p' 的 $(N - 1)$ 项。这两项在 Q 的计算公式中,也都和 $F(K, L) = (C + U + V)$ 即投入的“活劳动 + 死劳动”相乘。

很显然,这是很有意思的结果。因为这里明显地代表着两类生产力:一类是包含产生“剥削”在内的生产力,也就是 A 中的 $N \times p'$ 项;另一类却是完全没有剥削的生产力,它仅包含描述科技进步和市场扩展的效率因子 $(N - 1)$,而 $N = N_s \times N_e$ 。66 年前,斯大林在著名的《论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文里谈到过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规律。斯大林对“现代资本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给出的表述是:^①

用剥削本国大多数居民并使他们破产和贫困的办法,用奴役和不断掠夺其他国家人民特别是落后国家人民的办法,以及用旨在保证最高利润的战争和国民经济军事化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的资本主义利润。

(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而斯大林对“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表述是:^②

① 斯大林:《斯大林文集》(1934~1952 年),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627 页。

② 斯大林:《斯大林文集》(1934~1952 年),人民出版社,1985 年版,第 628 页。

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或者说,在斯大林看来,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以及相应的生产方式,其基本特征有两个侧面:一是剥削和掠夺,二是最大限度地追求利润。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以及相应的生产方式,其基本特征也有两个侧面:一是最大限度地利用“高度技术”,二是充分满足物质以及文化的需要。而因此,所谓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就是式中 A 的 $N \times p'$ 项;至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当然就是式中 A 的 $(N-1)$ 项。而尤其巧妙的是,这两类性质不同的生产力,在我们新导出的总生产函数 Q 的公式

$$Q = [N(1 + p') - 1](C + U + V)$$

里,都以“+”号加在一起!特别是,斯大林在他所给出的基本规律中,一个字也没有谈到所有制。

所以,新架起的“桥梁”,还能帮助我们回答或澄清十一届三中全会及改革开放以来一个极其重大的理论问题的争论:这就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占主导地位的国家……必须有一个资本主义‘补课’的阶段。……还有一种声音,这就是中国也完全可以跨越‘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过渡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中国土地上曾出现过的“资本主义补课论”和“跨越卡夫丁峡谷”之争。^① 它也有助于回答为什么人类有可能通过“共同合作、共同发展、共享共赢”的发展模式,来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值得注意的是,在新劳动价值论新导出的总生产函数的表述式中,还有许多丰富的内容。例如,它清晰地表明:在市场经济里,阶级和阶级斗争仍然存在,但阶级和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居于主导地位的,已改变为知识和劳动间既有差别又有合作的辩证关系;等等。我们将另行撰写专文,深入发掘总生产函数 Q 所包含的丰富的内容。

2018年第3期《红旗文稿》刊登了署名余崇言的题为《2017年思想理论领域主要热点问题》的一篇报道,其中特别谈到,有多位学者对如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进行深入研究和探讨。报道称:“有学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主要有三个来源,即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我国改革开

^① 参见本书第18页。另见本书第38页。

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经验、西方经济学的有益成分。”对于这一原则性意见,我们无疑甚为认同!

问题是,还需要有具体的方案,需要有具体的基本公式。不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经济学研究,都有它们的基本公式。本书新添加的第五篇——《我们能否在马克思主义劳动价值论和新古典主义经济学之间架起一座可以相互对应的桥梁?》,作为一篇有待进一步探讨的文章,也许可以作为尝试回答这一重大理论问题的出发点。而紧接其后的第六篇《价值、使用价值与科技:使用价值或效用的计量问题研究》和第七篇《新劳动价值论和建立适用于中国特色的有索洛余值修正的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则是对新劳动价值论及导出的生产函数公式的完整且严密的学术性论证的努力和尝试,这两篇均是学术内涵较丰富的科学论文。特别是第七篇,用了一些严密而近似的求解常微分方程的特殊技巧,这才真正将新劳动价值论和新古典经济学里被称为“三驾马车”的非线性的道格拉斯生产函数有机地联结了起来,也就是真正实现了这两种经济学理论的统一。

三、新收入的还有何祚麻等人陆续在全国各地参加讨论会或讲座的两篇演讲稿和一篇多位学者对其发表不同评述的报道和一篇商榷性的长文,另外就是支持本书作者观点的其他学者的两篇评论性文章

1. 首先是题为“我们能基于当代物理学方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框架吗?——一个劳动和效用相统一的新政治经济学初探”的论坛主讲用稿,它后面附上了相关机构对于这次讨论会的一篇较长的综合报道,也就是中国政治经济学智库和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资本论》研究室主办的“智库名家论坛”,对我在该论坛第4讲所做的讲演发布的一篇综述性的报道和评论。经济研究所高培勇所长,以及左大培、樊纲、杨春学、朱恒鹏、刘霞辉、胡家勇、越志君、陈昌兵、李仁贵、庆承瑞、王亦楠、李帮喜等50余位专家学者共同参加了讨论和点评。

这里需要向读者介绍的是,为什么“智库名家论坛”会组织这样一次规模不大但比较深入的研讨会?

正如我在讲演的开场白里所说:“物理学史上有一个长期争议的重大理论问题:光是粒子还是波?这两种理论,争吵了200多年。最后是在1905年,爱因斯坦在讨论光电效应的一篇文章里引入普朗克常数后,才统一为光的‘波粒二象性’的理论。而重要的是,正是由于人们对光的本质有了更深的理解,由波和微粒的分歧走向‘波粒二象性’的统一,这就导致20世纪初物理学的大革命,产生了相对论和量子力学。”

我进而指出:“经济学或政治经济学里的纷争,至今已有150年。那么,人们

能否借鉴物理学的历史经验,构建一个新的理论,解决已持续150年之久的争论?”

我还指出:“这并不是人们第一次提出这一问题。在中国,樊纲著有《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①;在国外,萨缪尔森在《经济学》第19版中,写了《一个折中主义的宣言》。”

由于我在前一时期也做了类似的工作,当然也就必然会向樊纲教授请教,征求这位先驱者的意见。

这里追忆一下樊纲教授探讨这一极其重大的理论问题的情况。那是早在1987年的事。那时经济学各种观点纷呈,争议不断。30年前,当樊纲教授在提出他自己的见解以后,必然而然地,立即遭遇反对和批评的声音,直到2016年,还有人写文章批判樊纲是推动中国向资本主义道路方向进行“改革”的三大“祸首”之一。所以可以理解,自那以后樊纲就转而“对中国经济现实问题的研究投入了太多精力”,而现在“何老的研究重新引起了他的兴趣,并借此机会对何老等给予他支持和帮助的学者表示感谢”。^②

但是,更需要向读者介绍的,是我在“我们能否基于当代物理学方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框架”讨论会的讲演里,除了对《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一书表示支持以外,还补充引用了一段习近平同志早在2001年第4期《东南学术》上发表的《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中,对樊纲同志“这一分析”所做的评述:“有的经济学家提出要通过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和凯恩斯主义主流经济学的比较与综合……使中国的经济学不仅成为一门真正的科学,而且真正成为实践的指导。”“这种观点虽然很有见地,但并不完整。”因为我们现在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建设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为主干,兼收并蓄地吸收西方经济学有关市场经济的理论研究成果。”^③(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实际上,习近平同志所提到的应如何“完整”化的建议,在朱绍文老师为樊纲教授该书所写的序言里也有类似的意见。朱绍文还说:“樊纲提出的方法是‘马克思主义新综合’。”^④问题是,怎样实现这一“马克思主义新综合”?

习近平同志早在2001年所发表的文章中对《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

① 该书1990年5月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1994年、2006年再版、三版。

② 参见本书第96页。

③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第32页。

④ 樊纲:《现代三大经济理论体系的比较与综合》,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序言第8页。

与综合》一书的评述,当然是对樊纲所持观点的重要支持,也是对何祚庥等人近十年来寻求几种不同理论的统一的问题的这一探索间接的支持。可是,长久以来,樊纲教授本人并不知道习近平同志对其有过“很有见地”的四字评述。社会公众,包括何祚庥这样的理论物理学工作者在内,当然更不会知道习近平同志在2001年对樊纲教授的研究有过“很有见地”这四个字的评述。

但是,由于何祚庥等人近十年来也介入了这一方向的探索和研究,于是又激起了那些曾长期批判樊纲“错误”的“马克思主义者”的愤怒。例如,2014年就有丁堡骏、于馨佳两位学者在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究竟是发展,还是背离和庸俗化了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文章^①,认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和边际效用价值论之间既不是可以相互替代,也不是可以相互补充的,而是根本对立的关系”,因而批评“‘新论’试图要调和均衡价格论和马克思劳动价值论”,进而在丁、于这两位“马克思主义者”看来,何祚庥等人的探索和研究,就是对“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的“背离”和“庸俗化”!

如果再仔细回溯一下中国的学者们有关政治经济学和经济学争论的历史,就可以看到,原来丁堡骏教授长期以来一直是实现综合或统一这一呼吁的积极的对立面或反对者。他在2005年出版的《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一书中,还有专门章节系统地提出批判,认为“劳动价值论与边际效用论综合在一起”,“毫无经济学意义”^②。

但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界似乎存在一个传统:只许他们批评别人,却不许别人反驳。我曾几次找到《政治经济学评论》的主编,要求刊登反批评的文章,却总是被拒绝!

直到2016年年中,一个偶然的的机会,我竟然“发现”习近平同志在2001年发表的文章里还有这段含有“很有见地”这四个字的评述。何祚庥当即用电子邮件转告了樊纲教授。于是,在樊纲教授推动之下,“智库名家论坛”便在2017年6月13日举办了一场研讨会。我在该论坛作为主讲人的演讲,也算是对那些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者”的一个回应。

这里,我们还想再介绍一段习近平同志2001年《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那篇长文里,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缺点所写的另一段评述^③:

① 丁堡骏、于馨佳:《究竟是发展,还是背离和庸俗化了马克思科学的劳动价值论——评何祚庥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发展”》,《政治经济学评论》2014年第2期,第91~116页。

② 丁堡骏:《马克思劳动价值理论与当代现实》,经济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67~274页。

③ 习近平:《对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东南学术》2001年第4期,第35页。

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虽然更为深刻地认识到了社会经济活动与人们的主观意志是密不可分的……但是,只要我们再做一些更深入的观察,就可以发现随着抽象方法的大量运用,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被抽象掉的许多因素,恰恰是正在对生产或流通过程发生作用的人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人的主观因素对社会经济活动的影响的认识方面,远不如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论述得那样全面和深刻。(着重号为引用者所加)

这真是“所见略同”!如果再考察一下何祚庥等人建议的新劳动价值论,那么这里新添加的“被抽象掉的许多因素”,恰好是习近平同志主张应当添加的“人的主观因素”,而且正好是习近平同志指出的,被抽象掉的“恰恰是正在对生产或流通过程发生作用的人的主观因素”。例如,在何祚庥等人新建议的4个基本公式中,新添加的描述“人的主观因素”的广义效率因子 N ,正好是“生产和流通过程发生作用的人的主观因素”,即:

$$N = N_s \times N_E$$

式中, N_s 即科技效率因子,是人的主观对生产过程发生作用的客观的因素; N_E 即市场效率因子,当然就是来自人的主观对流通过程发生作用的主观因素。

当然,习近平同志在《东南学术》刊出的文章,发表于2001年,那时,他并不是中央委员会选举出的总书记。我们不会拿着一篇2001年所写的文章去指责别人,说其背离总书记的“指示”等昏话。但至少我们在这里所谈的历史事实,以及我们所建议的改革传统劳动价值论的具体方案,也是可以提供给学术界共同探讨的吧?!

2. 对“智库名家论坛”第四讲主讲稿《我们能基于当代物理学方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框架吗?——一个劳动和效用相统一的新政治经济学初探》(以下简称《初探》)一文的补充介绍。

《初探》一文所讨论的新劳动价值论的许多内容,以及对旧劳动价值论的许多缺点的批评和如何改进的具体方案等,已有不少意见在那篇综合报道里有详细介绍,这里不再重复。

这里要补充介绍的是,在《初探》一文里,还有对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基础(一般均衡论)是否有严密的数理科学证明的较详尽的分析。当然它是以新建议的新劳动价值论为出发点,并从我本人更为熟悉的理论物理学的研究方法和角度来探讨一般均衡论是否属于已有严格证明的科学理论的。

《初探》一文指出：“所谓已有‘一套数学工具的严格证明’的‘一致均衡论’，其实并不严格。所谓证明的‘严格’性，只是在极其特殊的假定下（如必须保持函数的非凸性……），才‘严格’地导出他们期望达到的理想状态。所以，新老自由主义者所竭力主张的‘一致均衡论’，实际上只是在极有限的条件下才可能出现的一种假象，经不起科学上严格性的‘推敲’！”^①

更意味的是，此文还给出一个“我们新制作的一张图”。原图取自萨缪尔森《经济学》第18版一书第137页所给出的向后弯转的供给曲线，但“我们现在在该图中又新加上了一根直线形的需求曲线，和原图中的供给曲线相交”（见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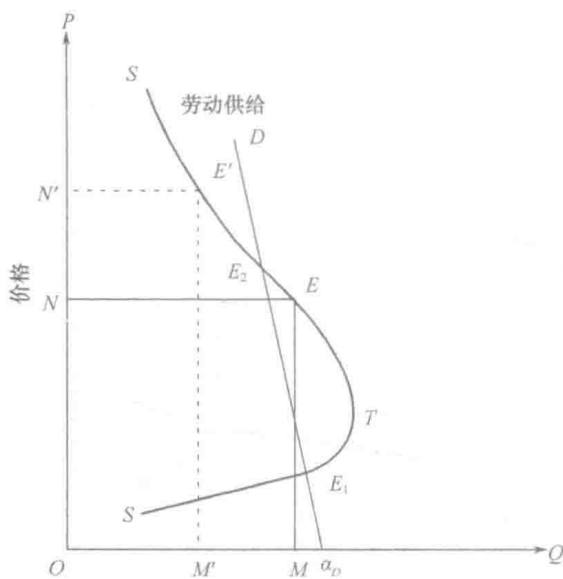


图1

“此图的特点是，这一向后弯曲的供给曲线S，再加一根需求直线D时，就必然出现两个均衡点 E_2 和 E_1 ，而当然也不排除只有一个均衡点的切线解，也可能是两根线不会相交的无解。所谓‘无解’，也就是根本没有均衡态！”

“如果又将上述有非线性修正的两组解答的均衡态引入一致均衡分析，新古典经济学‘严格证明’的‘一致均衡’，就至少有两组‘一致均衡’或仅在极特殊条件下出现的一组‘一致均衡’。哪一个解才正确？而如果人们又将‘无解’的上述非线性供需均衡模型引入‘一致均衡论’的分析，就只能说，根本不存在这种

① 参见本书第88页。

‘一致均衡’!”

所以,仅从上述劳动和效用统一的价值论中有关均衡态定义的简单讨论就可以看出,所谓“一致均衡论”的严格证明,完全是需要在错误的、“很不现实”的假定下才能导出的“严格”证明!

但是《初探》一文并没有完全、彻底地否定自由主义或新自由主义!《初探》主张,人们应“一分为二”地对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及其基础“一致均衡论”进行具体分析。因为经济社会现象是具有高度复杂性的现象。所以,《初探》一文又进一步说:“当然,如果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某些时期、某些局域的市场上,也有可能近似地出现满足‘一致均衡’的那些理想条件,因而充分利用那只‘看不见的手’来推动经济的发展,仍然不失为发展经济的重要方法。但重要的是,更多或更经常的情况下,更需要经常地伸出那只‘看得见的手’,也就是以两个截距 b_s 和 a_d 的宏观调节,作为市场失灵的补充!”

3. 新增加的另一篇,是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圈”2017年6月21日发布的一篇长篇报道——《何祚庥长文分析政治经济学创新:科技使得剩余价值消失,剥削将不再存在》——介绍的我那篇文章在《中国科学院院刊》发表时的原文。

这篇报道的基本内容,实际上是2016年8月《中国科学院院刊》第31卷第8期刊登的我那篇有关理论经济物理学研究的一篇长文——《必须用时代化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指导当代政治经济学的创新和发展》,该文2016年以“代前言”形式收入《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一书第1版时,标题改为“必须深入改革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中国科学院院刊》刊出的这一长文,文字上做了某些调整。

微信公众号“经济学家圈”在报道此文主要内容时,换了一个更醒目也更容易引起社会公众注意的标题——“科技使得剩余价值消失,剥削将不存在。”

那么,为什么科技竟能“消灭剥削”?一个最简单的理由是:由于机器人的出现,而且机器人还能完全地取代人类所从事的所有的“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那么,由“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所定义的“活劳动”所创造的剩余价值也就必然消失。^① 总不能说人类还应保障机器人的天赋“人权”,还应给予机器人以“人”的地位,或者说人类应终止剥削、压迫、掠夺机器人所创造的剩余价值吧?显然,在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里,机器人自身具有的价值将和机器一样,逐步转移到产品或商品中,但机器人的“劳动”不会创造出新的剩余价值!这就是我的这一篇

① 参见本书第24页。

长文的主旨。

当然,这篇长文更回答了我写作此文时更关注,也是社会公众迫切希望回答的一大问题——如何认识和解答邓小平提出的两大“历史之问”?

什么是两大“历史之问”?这就是邓小平同志早在1984年就提出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两大问题:什么叫马克思主义?什么叫社会主义?

写作这一长篇论文真正的目的,是试图从理论上探讨和回答这两大“历史之问”。而多年来,这两大“历史之问”竟成为马克思主义学者似乎难以回答的禁区问题。

其实,邓小平同志曾经在1992年给出了完整的回答。他说:“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①而特别重要的是,小平同志对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这五句界定的话中,没有一句提到所有制!

由本书第1版“代前言”移至增订版正文的这一论证“科技使得剩余价值消失,剥削将不再存在”的长文,是我进一步给出的回答。原来人们可以依靠科技进步和市场扩展来“消灭剥削”,而在传统的劳动价值论里,“消灭剥削”一定是依靠阶级斗争。那么,我们这种观点是否背离了历史唯物主义?否!历史唯物主义一直认为社会生产力是决定社会历史发展的最终决定性力量,而科学技术则是近现代世界新涌现的新型生产力,所以,邓小平同志也就一再强调“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前述《初探》一文所提出的新劳动价值论的基本公式及其解读,对两个“历史之问”又进一步给出了一个较完整的回答。

4.“经济学家圈”是欢迎不同意见的争鸣的。所以,它在《何祚庥长文分析政治经济学创新:科技使得剩余价值消失,剥削将不再存在》这篇长文之后,还发表了北京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者晏智杰教授所撰写的《与何祚庥教授商榷——“基于当代物理学方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框架”问题》一文。理所当然,晏智杰教授的这篇文章现在也随我们这篇长文一并收入本书增订版,也就是附在我们第九篇文章之后,供读者讨论、研究和参考。

晏智杰教授在《与何祚庥教授商榷——“基于当代物理学方法构建中国经济学的综合框架”问题》一文中,扼要地介绍了150年来经济学理论发展的历史进

^① 邓小平:《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373页。

程,并做出一个小结^①说:

可以看出,效用论和生产要素价值论,从根本上来说,反映了生产力发展的现实,并且发挥了引领生产力发展的作用;它们的发展和演变,与社会经济发展同步。这种要素价值论尤其与各时期市场经济发展的现实相切合,反映了市场经济运作和发展的基本法则,因而成为观察和调节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依据。要素价值论的发展,总是受到当时最先进的生产力动因的引领和推动,并将其提到创造价值要素之首位:最初是土地和劳动,然后是资本,再后是经营管理,现今则是科学技术。这说明,在价值创造中,总是有最先进的某种要素在起作用,这一点不会改变,但是这个最先进的要素是什么,却不会固定不变,事实上它是随着社会经济条件的变迁而变化的。价值论史还说明,效用和要素价值论从不否认劳动的创价作用,始终将劳动置于商品价值的源泉之列,但它否认视劳动为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不过,晏智杰教授却将何祚庥等人建议的新劳动价值论解读为某种生产要素价值论,认为这一新劳动价值论“否认视劳动为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也就是解读为偏离了马克思主义。

需要声明的是,这是晏教授误解了新劳动价值论。准确地讲,新劳动价值论一直坚持社会平均必要简单劳动仍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而且新劳动价值论还一直批评中国有一群政治经济学家妄图在这一唯一源泉之外,还要添加一项所谓“成正比”的另一源泉。我们也一直认为这是篡改了马克思所提出的劳动价值论的基本观点。但是,我们还认为,在“坚持简单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这一基本观点以外,还必须补充增加“脑力劳动×体力劳动”是创造使用价值的源泉或“劳动×知识”是创造效用的源泉。或者说,新劳动价值论其实是某种多生产要素的使用价值论。

5. 为了回答《何祚庥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1版出版后对我们提出的新观点点名或不点名的各种批评,本书这次新版的增订版还新增了一篇由张晓芳、庆承瑞新撰写的对丁堡骏先生批判性意见的进一步反批评的文章——《发扬科学精神,抛弃本本主义——再评丁堡骏教授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发展路径的探讨》。

特别要在这里强调的是,新增的这篇文章用一系列有说服力的论据,深刻批

^① 参见本书第125页。

评了丁堡骏先生对马克思劳动价值论所持的一种“可笑”的观点——他在一篇新撰写的长文《评何祚庥的所谓“新劳动价值论”》中,竟然说:“至于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之间的关系……任何一位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的人,都不会试图要在使用价值量和交换价值量二者之间的数量关系上寻找固定不变的函数关系或者相等关系。”^①

然而,张晓芳和庆承瑞所写的反批评文章却轻易地指出、击中了丁堡骏此文的要害:“马克思在《资本论》第1卷的第1篇第1章第1节……第一次提出交换价值这一概念的内涵时,就明确指出:‘交换价值首先表现为一种使用价值同另一种使用价值相交换的量的关系或比例。’”^②而显然,这里所谓“量的关系或比例”,当然就是丁堡骏先生所批评或反对的“寻找固定不变的函数关系或者相等关系”!如此一来,按照丁堡骏的逻辑,马克思本人是不是也应当不是一位“有一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常识的人”?!

6. 新收入本书的还有王亦楠研究员原刊于《中国经济周刊》2017年第35期上的《“对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点思考》一文。

此文首先引述了习近平总书记在2017年7月26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上所做的重要讲话,该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发展阶段”,“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我们要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就要在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基础上,以更宽广的视野、更长远的眼光来思考和把握国家未来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战略问题,在理论上不断拓展新视野、作出新概括”。

极有意义的是,此文除了引述一些西方经济学家等学者(如萨缪尔森、斯蒂格利茨以及福山、皮凯蒂等著名学者)对2008年金融危机的大反思,还引述了林毅夫教授根据世界银行对200多个发展中经济体的调查研究结果所做的结论:“事实证明,迄今为止,还未看到一个发展中经济体按照西方主流发展理论来制定、推行政策是成功的。少数几个发展绩效或转型绩效比较好的经济体,所推行的政策从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来看都是错误的。”

此外,此文还着重引述了前引习近平同志2001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再认识》一文所写的一段重要意见:“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时被抽象掉的许多因素,恰恰是正在对生产或流通过程发生作用的人的主观因素。由此可见,马

① 见红色文化网,网址:<http://www.hswb.org.cn/wzzx/llyd/ii/2017-11-02/4703q.html>。

② 见本书第134~135页。